

「書體」及其政治應用： 東漢安帝年間作為符瑞器物的篆書石刻^{*}

邱尉庭^{**}

提 要

傳統上，「書體」多被歸在小學、書法史、書法美學等研究範疇，較少透過政治文化、思想的角度加以解析。本文嘗試透過史料重構今、古文經文本的建立過程。自秦始皇焚書、挾書律起，古文簡牘遭毀，口傳與今文經體系遂興。至西漢末劉歆倡立古文經、新莽以小篆鑄「新嘉量」銘文，「古文字」成為參與政權建構與神秘學語境的符號。進一步整理西漢晚期至東漢中期之石刻書體風格史，本文認為永初至延光年間篆書石刻大量集中出現的現象，與東漢古學發展、執政者崇古以及《說文解字》成書等背景緊密相關，顯示石刻書體之選擇具有政治與文化思想內涵。最後，本文以實體石刻圖文、瓦當，結合緯書等文獻資料，說明篆書在此時期常與神靈祭祀、識緯符瑞之題材相聯繫，乃因當時頻發天災，古文字與神秘學結合成為「符瑞器物」，運用於當時之意識形態與政治治理。

關鍵詞：篆書、器物文化、符瑞、漢代思想史、漢代書法史

* 收稿日期：2025年8月11日；通過刊登日期：2026年5月5日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指正原文不足之處，並提供具啟發性的寶貴建議，使本文得以進一步修正與完善，謹致謝忱。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暨兼任講師

一、前言

自漢魏六朝以後，中國的文字書寫模式大致定型，由秦系文字「隸變」後，進一步發展出的楷書逐漸成為通行標準。魯恭王（劉餘，約前 160- 前 128）壞孔子（前 551- 前 479）舊宅以廣其宮，並於孔宅壁中得古文經傳的歷史場景，¹ 對後世而言已難以想像。在教育體制的規範與普及之下，文字造型的使用變得理所當然，書寫活動不再需特意「選擇」用篆書還是隸書，「書體」本身所蘊含的文化意義，亦往往被當代人所忽略。以往關於書體的研究，多分屬文學與藝術兩個不同學科領域：前者偏重於文字學的析論，後者則關注其書法美學、書法史與風格史等問題。本文則欲跨越此一分野，嘗試從政治文化的視角出發，觀察書體如何在東漢時期的器物銘文中被實際操作、選擇，從而分析其背後蘊藏的政治、文化象徵。²

兩漢時期除了是文字隸變的重要階段，文字載體的多樣性使得文字記錄活動區分為較正式嚴肅的金石銘刻文辭與日常用途之簡牘書寫。而東漢石刻種類繁雜，可再依文辭與用途細分為人物或事件之紀念碑、喪葬墓碑、契約石券、神靈祭祀碑和符瑞石刻等。其中「神靈祭祀碑」與「符瑞石刻」多由地方首長所建立，且於安帝（劉祐，94-125）在位之永初至延光年間（107-125）密集出現，應與其政治背景及當時頻繁的天災有高度關聯。其次，此時期石刻之書體常見使用篆字之趨勢，形成書體選擇上的特殊現象。本文即欲聚焦於此，透過比較篆、隸兩體在石刻上的應用差異、今古文學派的發展脈絡，進一步梳理安帝朝政治背景、讖緯思想的興盛對於石刻之影響，說明「書體」並不是單純的一種藝術形式，而是經過政治與文化詮釋後所呈現的結果。

由現今所見之出土文獻、石刻拓本、文字紀錄可以看到漢代書體風格多元並存的現象。如許慎（30-124）《說文解字·敘》中所提到新莽居攝時，改定古文而有通行的六書：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

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

1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冊 8，卷 53，〈景十三王傳〉，頁 2414。

2 本文中「書體」指「篆」、「隸」、「楷」、「行」、「草」五種字體，「篆」之名係一廣義泛稱，西周之「金文」、東周列國「古文」、秦統一文字後的「小篆」與漢代方正形體之「繆篆」，均屬「篆書」之範疇。

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³

可知在漢代知識階層的生活之中，篆、隸等不同書體同時並存，且依其性質分別應用於不同載體與場合，而非單向線性演變。在此背景之下，「篆書」作為漢字較早期的書寫形式，其字形結構保留較多象形特徵，並在書寫過程中展現出一定程度的視覺表現性。

德國漢學與藝術史學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於其著作《書跡：中國古代書法研究》中提出：「在毛筆的筆跡中，人們可以看到一種準圖像學式的書寫者的個性表達。」⁴由此觀之，書體不僅是語言的載體，同時亦具有視覺與表現層面的特質。故不妨延續這個視角，於研究方法上，不將漢代石刻中的書體視為單純的文字外觀形式，而是嘗試從多重層面加以觀察與分析：首先以兩漢經學發展為切入點，觀察今、古文經在文本建立與學術流變中的差異，如何影響書體的實際應用。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結合石刻文本內容與題材類型，分析篆、隸書於不同石刻中的使用情境，考察其內容與風格上的差異。進而將上述觀察置於當時政治文化變遷的歷史脈絡之中，說明書體並非被動的書寫工具，而是在思想與權力運作之下被選擇與運用的一種文化表現。

「文字」於中國傳統的藝術品或器物應用明顯較西方更為普遍，在早期的中國，特別是關於權力展示、宗教、祭祀之器物中扮演重要地位。自西周青銅器銘文至漢代各類碑銘，文字皆為器物構成的重要部分。美國藝術史學者王靜芬（Dorothy C. Wong）指出：

漢代後期開始，權力由中央擴散到地方，漢代以後加速，這一歷史進程和東周時期發生的權力由王室擴散到地方封建國家的過程相似。在這兩個過程中，禮儀器具在權力的轉移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周代時銅鼎是上天授予統治權的禮儀器物，象徵至高的政治權威。在漢代和漢代以後，石碑是儒

3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2016），頁768-769。按文意及書體歷史，原文「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此句應移至「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之後。參見黃天樹，《說文解字通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39。

4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吳秋野譯，《書跡：中國古代書法研究》（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23），頁118。

家德行的象徵，也是社會地位、文化聲望和德政的象徵。擁有和陳列青銅器及石碑意味著擁有權力、自治和合法的統治。⁵

可見這些禮儀器物本身就蘊含深刻的政治文化象徵寓意，它們在視覺上的大小、形制、所使用的裝飾圖案、乃至於字體大多是經過精心安排設計的，並非隨機、任意的選擇。因此，金石碑刻上的書法，不應僅被視為文本紀錄的附屬形式，而應與器物整體一併觀察。其書體風格本身，即為構成器物意義的重要部分，並參與了當時政治與文化意涵的建構過程。

若將東漢時期各種內容的石刻進行分類，可以發現一個現象：隸書應用於主流政治思想宣傳、人物（多為政府官員）紀念碑、儒學石經等用途。少數的篆書石刻內容則與祭祀神靈、符瑞思想或特定政治背景相關聯（待後面章節詳論）。因此可以了解，不同的書體對應不同的主題內容，包含故事敘事、寓意表達、政治意識形態等，具有選擇性與差異性。

東漢時期的石刻文字以隸書為主流，⁶ 西漢末期至東漢前期的石刻多為帶有篆書特徵的「古隸」，東漢中期以後因受儒學國教化以及重喪葬之風潮影響，以紀念、頌德、傳遞政治思想為主要內容的碑碣大量出現，⁷ 其書體筆劃波磔明確、字形莊嚴穩重，是成熟的「八分隸」。⁸ 華人德在《中國書法史·兩漢卷》中作出統計：

而今考古從地下不斷有所發現，存世兩漢碑刻或刻石已毀佚而拓本倖存者，共約有 400 餘種，其中絕大多數是東漢碑刻，尤其集中在東漢中後期，可以想見當時之盛。⁹

5 王靜芬 (Dorothy C. Wong)，毛秋瑾譯，《中國石碑：一種象徵形式在佛教傳入之前與之後的運用》(Chinese Steles: Pre-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64。

6 「石刻」是一個廣義的名稱，細分其種類，大致可以分為「刻石」、「碑碣」、「摩崖」、「闕銘」、「墓誌銘」、「磚瓦文」等。然而如清末民初金石學者馬衡 (1881-1955)《凡將齋金石叢稿》所言：「今人謂文之載於石者皆曰碑，其實不然。刻碑之興，當在漢季，古祇謂之刻石。」後世多已模糊「刻石」與「碑碣」之分界，故為便於敘述，本文將研究對象中不論是刻石、碑碣、闕銘等均稱為「石刻」。見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 65-66。

7 角井博監修，《中國書道史》(東京：芸術新聞社，2009)，頁 31-32。

8 「古隸」是由篆書所派生，文字隸變階段的過渡書體。現在所稱「八分隸」是由古隸接著發展而來，波磔明確、有均勻美的成熟隸書體。參見玉村霽山，《中國書道史年表》(東京：二玄社，2018)，頁 19-27。

9 華人德，《中國書法史·兩漢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頁 119-120。

又指出：

東漢以隸書碑刻數量最多，篆書碑刻存世的只有〈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少室石闕銘〉、〈開母石闕銘〉等少數幾種，其中墓碑只見袁安父子二碑，這和東漢盛行今文經學不無關係。¹⁰

可知東漢篆書石刻乃是相當珍稀的存在。除了上述五種，本文試將現存可見之東漢篆書石刻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 東漢時期篆書石刻表

石刻名稱	建立時間(西元)	字體	類別	附註
祊縣平山神祠碑	約 25-34 年	繆篆	神靈祭祀	殘損部份多，可辨識者約五十餘字。
袁安碑	不早於 106 年	小篆	紀人	碑中以諡號稱漢和帝（劉肇，79-106）為「孝和皇帝」故可知此碑應立於漢和帝崩後，或有學者質疑此碑之真偽（詳見後述）。
袁敞碑	117 年	小篆	紀人	殘損部份多，但書風與袁安碑同。
祀三公山碑	117 年	繆篆	神靈祭祀	
李昭墓碑	118 年	小篆	紀人	
嵩山少室石闕銘	123 年	小篆	神靈祭祀	殘損部份多，可辨識者約七十餘字，有描述祥瑞之詞，石刻末有祥瑞圖樣裝飾。
嵩山開母石闕銘	123 年	小篆	神靈祭祀及大禹治水之事蹟	文字大部分尚可辨識，多有描述祥瑞之詞。
延光殘碑	125 年	繆篆		殘損嚴重，內文難辨識。
麒麟鳳凰碑	126 年	小篆	符瑞思想	原石、原拓今已不傳，文字記載見錄於趙明誠（1081-1129）《金石錄》、洪适（1117-1184）《隸釋》等文獻。

上表所列者即是本篇文章主要的分析對象，除了挑選出以篆書為書體的石刻之外，我們可以發現：除了〈祊縣平山神祠碑〉建立時間較早，東漢主要的篆書石刻大多出現於漢安帝在位的永初至延光年間，於時代有高度集中的現象。此後直到三國曹魏〈三體石經〉、孫吳〈天發神讖碑〉、〈封禪國山碑〉以前均未見到篆書石刻。本文將針對此觀察，於往後之章節中逐步探討安帝時期篆書書體如何結合經學發展、政治文化，並與讖緯符瑞聯繫應用。

10 華人德，《中國書法史·兩漢卷》，頁 136。

二、今、古文經文本建構過程對西漢書體應用之影響

在分析東漢永初至延光年間篆書石刻之成立因素之前，有必要先從兩漢經學發展的角度切入，觀察今、古文經在文本建立過程中，如何影響書體的實際應用。依前所引述，華人德於《中國書法史·兩漢卷》中指出東漢以隸書碑刻為主流，「和東漢盛行今文經學不無關係。」此說雖已嘗試聯繫經學發展與書體應用，但華氏於書中並未深入論述。東漢之今文經學雖佔據官學地位，實則古文經學也同樣盛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今文經學佔優勢的背景之下，永初至延光年間篆書石刻之集中出現，格外值得注意。

一般在討論漢代書體之應用時，除石刻拓本之外，出土的簡牘文字亦是重要材料。簡牘文字以便利書寫與傳遞為主要目的，故兩漢簡牘所見多為隸書，戰國晚期之《睡虎地秦簡》亦已呈現高度隸變之趨勢。裘錫圭（1935-2025）指出，由秦代權量銘文可見隸書已逐漸侵入小篆的書寫領域，且至西漢時期，在距秦以小篆統一文字尚不久之際，隸書即已取代小篆成為主要通行文字，認為「秦王朝實際上是以隸書統一了全國文字」。¹¹由此可知，隸書之興起與普及，並非漢代才開始的現象，而是在秦漢之際即已逐步形成。

但我們並不能否認漢代簡牘存在使用古文篆字的實況，如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初期的《居延漢簡》中即可見篆書字跡的削衣：

隸書雖然是漢代通用的書體，但字書很可能仍以篆體為正體。敦煌出土的大量《蒼頡》削衣上，可以看見很多習字具有濃濃篆書的筆意，居延也出土了練習篆書的削衣，這些篆書都具圓筆、字形瘦長的特色。漢代邊塞的士卒在日常文書中雖然不使用篆書，但仍然要練習。¹²

至於書體實際的應用與今、古文經的寫本問題，於今已難得見全貌，若由《居延漢簡》中的篆書削衣、東漢許慎之作《說文》、三國魏之《三體石經》等文獻來推測，古文字的書寫與應用並沒有因隸書的流行而消失，反而應在某些條件下與政治需求結合，因此我們需要藉由今、古文經的發展過程探討之。

11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1995），頁91。

12 丁瑞茂編，《小學之道——從漢簡看漢代識字教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頁89。

漢代今、古文之爭涉及文本、學派以及古籍、古文字等不同層面的問題，一直是經學史上備受關注的議題，而篆、隸書體的應用與演變，亦與這些爭論密切相關。¹³ 由劉歆（約前 50-23）閱宮中典籍而發〈移書讓太常博士〉、或東漢之東觀校書等事件來看，本質上都係因文本使用之書體不同，進而使內容相異而有所爭論或校訂之需求。若當時古文書皆全以隸書重新謄抄，至許慎時自然也沒有作《說文解字》以正文字之必要，純粹是文本內容校讎罷了。

古文經的文本以古文（多為六國文字）寫成，¹⁴ 而在漢代實際器物、書寫應用中，六國古文、小篆與繆篆共同被視為相對於「今文（隸書）」的「古體文字」，故兩漢書體演變與應用問題，實不能忽視六國古文、小篆、繆篆等古體文字於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誠如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謂：

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¹⁵

由「馬頭人為長」、「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等敘述來看，可知至東漢時已有相當一部分知識階層習慣於隸變之後的文字形體，甚至對於小篆原有的構形與部件未必熟悉。小篆對於西漢人來說應尚不陌生，較古文經所用之六國文字更易識讀。然而至許慎時代，秦小篆雖不能等同於「古文」，卻已逐漸轉化為相對於今文隸書的「古體書寫形式」，故《說文》需以小篆為字書正字，補以古文、籀文。在此意義下，小篆一方面承接先秦文字傳統，另一方面又與隸書形成對照，在六國

13 有關經學與文字學的創立與歷史背景，可參見黃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增訂本）》（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頁 17-20。

14 錢穆（1895-1990）於〈兩漢博士家法考〉文中認為今、古文之爭在西漢乃是「王官學」與「百家言」之爭，並援《史記》中出現的「古文」詞例，謂「古文」指的是「六藝」；錢穆進一步透過「章句」與「訓詁」治學方法之別，認為至東漢亦無今文、古文之別，而是「今學」、「古學」之辨。夏長樸（1947-2021）則將兩漢「古文」整理為三種意義：「『古文』一詞，在漢代涵義極為豐富，大概來說，包含三個意義：（1）上古的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籀文，以及王國維所說的通行於六國的文字；（2）秦以前的文獻典籍，《詩》、《書》六藝當然包括在內；（3）『古文經』或『古文學』的簡稱。」林惟仁承續夏說，指出錢穆過度分割了「古文」一詞所兼具古文字、古籍涵義，本文亦從夏氏、林氏之說。參見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臺北：東大圖書，2023），頁 221-243；夏長樸，《儒家與儒學探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4），頁 211；林惟仁，〈錢穆論兩漢今古文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9 期（2016.9），頁 178-185。

15（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 770。

古文與今文隸書之間，具有某種過渡與聯繫的功能，並逐步被賦予古典與正統的象徵意涵，此一現象可見於稍後所討論的王莽時期〈新嘉量銘〉。

承此，在傳統經學史的視角中，「書體」雖然不是今、古文經在文本爭論上的首要主體，卻依然被賦予了區別今、古政權的象徵性意涵。如秦滅六國後，頒行挾書律，焚六國史書、百家語，文字統一政策，即是由制度層面將思想與文字之主導權重新統合，避免多元文化與思想對集權體制產生衝擊，故秦以小篆區別六國古文，由政治面看來即是一種古今字體的相爭。

秦燔六經與挾書律對於漢代書體最直接的影響即是「大量消滅了古文經書的實體文本」，雖然秦時博士官所職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可排除於律外，並非完全沒有文本，但殘存的文本集中於少數人手中，或隱而不出，且漢初採黃老治術以養民生息，無暇顧及文化事業之恢復，挾書律至惠帝四年（前 191）才廢除，使西漢初期儒家經典的傳承，多須仰賴有限文本與口傳並行的方式。形成師法與家法，進而衍生成學派集團：

兩漢經學的師授，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遷：第一階段在漢武帝時期，產生了第一代經學先師和師法；第二階段，在昭、宣以後，出現了第二代經學大師和「家法」；第三階段，西漢末年至東漢，家法又繁衍為眾多的學派，結成了許多派別集團。¹⁶

其中，從第一代經學「師法」至第二代「家法」的形成過程，即是西漢口傳經學重建文字文本的一段重要轉折時期。¹⁷ 據史冊所載，漢文帝（劉恆，前 203- 前 157）時伏生（生卒年不詳）傳經予晁錯（前 200- 前 154）。¹⁸ 伏生當時年事已高，

16 章權才，《兩漢經學史》（臺北：萬卷樓，1995），頁 91。

17 有關「師法」、「家法」區分異同之論古來有之，但因非本文著重之處，故僅於此註中淺述。王博玄〈唐代以前經籍注解體裁研究〉文中已有精實之論述，本文承其說，認為：「師法、家法在性質上本無區別。……師法者，就人而言，謂其師傳；家法者，乃就學術而言，謂其學派。師法既傳先師之言而各自異法，即所謂『家』；家法既由專相傳祖而來，實即師法。」然而，筆者認為從師傳到學派之建立雖在本質上無異，但在「階段性」上仍是可區分的過程，先有「人」而後有「學術學派」，故引章氏三階段說。見王博玄，〈唐代以前經籍注解體裁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頁 121。

18 《史記·儒林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見（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冊 2，卷 121，〈儒林列傳〉，頁 1276。

口語之齊魯方言難以聽辨，故有其女（或說為孫女）羲娥（生卒年不詳）翻譯伏生背誦的《尚書》，再由晁錯謄錄。¹⁹又或如《漢書·藝文志》所述：「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²⁰從這些記載可知：西漢經學建立之初，經典傳承重視口傳與師說，且文本尚未定型，異文、通假現象普遍，因而經師的口述講解對於文本理解與傳播至關重要。

師法、家法之學派既逐漸成形，國家亦從戰亂後復興，若要進一步發展成帝國的思想主體，文字文本是必需的。楊軍在〈口述與文本：兩漢經學今古文新議〉文中指出：

在西漢立五經博士之前，今文經已經存在著將口傳內容寫為文本的傾向。這個轉軌過程經歷了兩個階段：前期是沿襲先秦傳統，出現學者創作的單篇作品；後期發展為學者將個人對某部經的闡釋要點寫成著作。……要注意的是，西漢易學未立於學官的兩家——費直、高相，《漢書·儒林傳》強調其皆無《章句》。由此來看，完全依賴口傳、沒有任何文本的學派，是不能被立於學官的。也就是說，西漢立於學官的所謂今文經學，是傳統口述經學的一個新興支派，既重視口授傳統，又開始將口耳相傳的內容整理成文本。兩者缺一，皆不得立於學官。公羊、穀梁兩家得立於學官，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已將口述內容整理成文本。²¹

因此，新一代以今文隸書謄寫的經學文本體系被建立起來，同時也意味著今文隸書的書寫需求與地位逐漸提升。如《漢書·藝文志》中記載漢興時，蕭何（?-前193）承秦制而定律，要求「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²²「六體」即包含古文篆籀，可知漢初學童習字應古文、今文並重，但在武帝（劉徹，前156-前87）立五經博士之後，學官的選才辦法中已不見對於古文書寫能力的明文要求，轉而規定能通一藝之經。²³

19 卓加真，〈中國稗官與正史上的女性譯者〉，《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2卷2期（2012.6），頁42。

20（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冊6，卷30，〈藝文志〉，頁1715。

21 楊軍，〈口述與文本：兩漢經學今古文新議〉，《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5/t20230519_5639172.shtml（檢索日期：2025年2月11日）

22（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冊6，卷30，〈藝文志〉，頁1721。

23《史記·儒林列傳》：「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

此外，《漢書·藝文志》亦記載了武帝時期為建藏書而設置寫書官員：

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²⁴

這些寫書官員抄錄由博士官所傳的經書，都是使用今文隸書，²⁵ 故隸書在實際應用上更為普及，亦進一步鞏固其作為經學文本書寫的主要地位。

在此背景底下，即便以六國古文寫成的文本重新被發掘出來，也難以輕易撼動今文文本的地位。據《漢書·景十三王傳》所載：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²⁶

可知壞孔子舊宅得壁中書應是恭王到魯地不久之事，即西元前 160 年頃。此外還有河間獻王（劉德，?- 前 130）蒐集古文經書的紀錄、淮南王劉安（前 179- 前 122）亦喜好書籍。²⁷ 這些事件均發生於景帝（劉啓，前 188- 前 141）在位期間，可知此時貴族與知識階層已認識並開始蒐集古文經書，早於武帝立五經博士（前 136），但古文經並沒有因此被立於學官。從政治角度來看，古文經即便內容古正，卻無法對當時的帝國治理產生積極有效的幫助。

漢帝國初期，戰事甫定，民生凋蔽，故將黃老尚清靜無為之術作為國策，如竇太后（竇漪，?- 前 135）即是黃老之術的重要推行者，且掌政橫跨景帝、武帝兩朝，雖使民間得以休養生息數十年，但先秦以來其他的思想學說也因此復萌，不利於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整合。林聰舜在〈帝國意識形態的建立——董仲舒的儒學〉文中指出：

補博士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見（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史記》，冊 2，卷 121，〈儒林列傳〉，頁 1274。

24（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冊 6，卷 30，〈藝文志〉，頁 1701。

25 黃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增訂本）》，頁 19。

26（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冊 8，卷 53，〈景十三王傳〉，頁 2413-2414。

27《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見（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冊 8，卷 53，〈景十三王傳〉，頁 2410。

黃老思想除了無法有效解決漢帝國在實行幾十年的無為政治後，產生的新矛盾與新問題外，就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任務而言，黃老基本上是不夠積極的思想，因此只適合過渡時期的需要，擔當社會上層建築之核心的工作，就不能不讓位給儒家，尤其是董仲舒那種儒家了。²⁸

設想當漢武帝欲將黃老清靜無為的治理模式轉型為獨尊儒術時，最重要的即是「有本有據」地透過教育、宣傳建立新的帝國意識形態。站在國家統治所需要的務實政治行動作為考量，在文字教育與文本選擇上使用通行的隸書，是可以配合快速推動思想普及的積極手段。

因此，有師法傳承體系，且文字通俗可識的隸書文本相比於出處受質疑、文字較難以識讀的古文文本，擁有相對優勢。其次，當武帝需要將「政權的正當性」、「君權的神聖性」、「天人感應的世界觀」援入儒學時，²⁹ 今文經在應用上有更彈性的解釋空間，³⁰ 古文經文本既已寫定，自然不利於政治操作。最後，古文經學派的文本內容與解經形式與今文經有相當多的差異，且古文學派有意爭取立於學官，直接挑戰了今文經派閥的既得利益。³¹

綜上所述，在「經文傳承」、「政治利益」各方面爭論下，「書體」亦可成為經學爭論中的一個面向，如成語「鄉壁虛造」即是今文經學的擁護者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指控孔壁中書為虛造之物。今文經學在政治與教育體制中逐步占據主導地位後，隸書遂成為官方文書與經學教育的主流書體，學習者對古文篆字的掌握需求因而趨緩。然而，篆書並未消失，而是退居於印章、碑刻、器物等特定場合，保留其象徵性功能。總之，西漢前期隸書的演變與普及，乃一多元且複雜的歷史過程。宏觀而言，隸書因書寫便捷，成為主流書體本就是順勢發展的結果，經學政策與今文經文本的建構，僅為其中諸多因素之一。雖不能斷言隸書之普及

28 林聰舜，《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頁145。

29 林聰舜，《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頁142-143。

30 秦漢之時，陰陽家學說影響了漢代人的世界觀，今文家多採陰陽家之言解經，認為「天道」、「人事」交相感應，故漢代儒者多言災異、援讖緯。其中《公羊》學因其解經方式重「名分」、「義法」，目的在闡釋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幽旨，故傳統上認為《公羊》「傳義不傳事」。既然《公羊》側重於名分義法，解經者個人之主觀意識就很容易滲入其中，使得《公羊》的傳統更能彈性配合時人世界觀以及執政者之需求。

31 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經學通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7），頁585。

完全繫因於此，但可以確定的是，今文經文本建構與相關制度設立，對於隸書的學習與應用推廣，確實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加速作用。

西漢中期以後，如《漢書·儒林傳》中所述：「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³²可見此際經學發展之繁榮，但經說內容充實、學習者增加，也同時意味著學術必然產生分歧。且既得利益之經師、文士集團壟斷仕途：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³³

故宣帝（劉詢，前 91- 前 48）時召開「石渠閣會議」，講五經同異。³⁴各家博士的設立，即代表口傳經學進入文本系統後，首次由官方對於特定家學文本之認證，並進而敷衍出「章句」之學，故立於學官的各經才有章句，章句也使得漢代經學開始走向繁瑣的道路。

今文經學本重於師法對於「義理」之闡釋，而「章句」是經師對於經文整段逐句的文義解釋，本也是由闡義而來，但當「一經說至百餘萬言」或如秦延君（生卒年不詳）能說《堯典》篇目至十餘萬言，即淪為形式化之無意義辨析，故哀帝（劉欣，前 26- 前 1）時有劉歆欲爭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於學官，作〈移書讓太常博士〉：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³⁵

32（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冊 11，卷 88，〈儒林傳〉，頁 3596。

33（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冊 11，卷 88，〈儒林傳〉，頁 3620。

34（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冊 1，卷 8，〈宣帝紀〉，頁 272。

35（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冊 7，卷 36，〈移書讓太常博士〉，頁 1970。

毫不客氣地抨擊當時今文經學之弊端，並順勢提出復興古文舊書之論：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聞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³⁶

劉歆爭立古文之論使得古文經之文本認定議題得以檯面化，並且對於之後王莽（前 45-23）篡奪政權之論述起到了相當大的幫助，特別如「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這一段文字不僅將古文與禮法結合，更有以外學（經學）與內學（讖緯學）徵驗相應之神秘思想。此外，劉歆所見古書，應係六國古文寫成，故此處「古文」除了指「古文經籍」，也同時包含了「古文字體」，二者在這樣的論述包裝下，除了經學與政治需求之外，開始與讖緯等神秘學應用產生聯繫。

在此之前的經學其實並無今、古文之區分，朝廷所立十四博士都是今文學。這個時期在政治上發生了王莽的崇古改制，在書法史上則可見篆書的石刻、器物出現，此二者應是緊密相關的。在王莽正式篡漢之前，他便積極利用古文經學作為日後奪權的工具，於制度上也十分積極於稽古之事：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群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于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³⁷

36（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冊 7，卷 36，〈移書讓太常博士〉，頁 1970-1971。

37（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冊 12，卷 99 上，〈王莽傳〉，頁 4069。

這段紀錄除了可見其對於古文經的重視，亦注重《史篇》（即《史籀篇》）古文字，異能之士即能通曉古學、古文之人。王莽本身出身豪族，群臣奏言將王莽比作周公（生卒年不詳）一般功德爛然，可見其復古周制之理想願景深深吸引當時的菁英階層。再配合劉歆等人巧辭借伊尹（?- 前 1549）、周公攝政之說，將王莽吹捧至政治核心：

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³⁸

王莽即位後，依照所謂理想的「古制」，對官制、土地、貨幣、曆法、度量衡、樂儀，乃至奴婢制度、人名規則等施行改革，幾乎涉及當時社會制度的各個層面。除了古文經與上述制度復古，本文所欲關注的篆書應用，即在象徵王莽政治之權力器物中展現出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為「新嘉量」（圖 1）。

《漢書·律曆志》中對於「量」器物之形制有詳細的記載，其中相當重要的一段為：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³⁹

吳旻旻在〈器物上的「新」面貌：王莽時期度量衡、銅鏡、錢幣的文化觀察〉文中對新嘉量以及其製造進行詳細考察，指出《周禮·考工記》中所載「梟氏量（或稱周鬴）」對於王莽造嘉量具有啟發意義：⁴⁰

38（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冊 12，卷 99 上，〈王莽傳〉，頁 4090-4091。

39（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冊 4，卷 21 上，〈律曆志〉，頁 967-968。

40《周禮·考工記》：「梟氏爲量，……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概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見（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板橋：

臬氏量顯然帶給劉歆極大的靈感，該器名曰「嘉量」，結合律度量衡的設計，以及容器上鑄刻典正的銘文，劉歆皆效法而運用到新莽嘉量身上。至於兩者的差別，重點不在於三器合一變成五器合一等細節，而在於以下兩點：其一，臬氏量僅文獻上記載其形制思維，並未見傳世實器，很可能只是設計理念；新莽銅嘉量則突破技術的困難，實實在在地鑄造出來；其次，新莽銅嘉量意圖「器以象道」，在形象上它融入「參天兩地」、「陰陽之象」，藉由外觀傳達天地之理，將抽象、不可見的「道」藉由這個具體、可見的「器」來「象」之；而且兩耳「其狀似爵，以縻爵祿」，寓有君臣層級、官職爵祿的意義，所以從天地陰陽、君臣分際、民生黍粟，都被視覺化地體現在這個器物上。這是之前的臬氏量所沒有的。⁴¹

吳氏進一步指出此銘文實質上即為其即位詔書，旨在強調天命所歸與道統承繼，其形式亦明顯效法秦始皇（嬴政，前 259- 前 210）於度量衡器上刻銘詔令之作法。新莽嘉量作為一種設計繁複的度量衡器，兼具制度整合、象徵天道與實用功能，其上所鑄銘文隨器物流布各地，遂成為傳播帝國意識的重要媒介。⁴²

值得深入分析的是，新嘉量作為政治宣傳的物件，理論上使用「隸書」應更易於識讀流通，但王莽卻選擇使用篆書，而且其篆書造型甚至比大多數秦權量、詔版上的文字更加嚴謹且工整美觀（圖 2、3）。此一現象或可援引裘錫圭由隸書名稱起源所提出的看法，延伸思考秦漢之際篆、隸書體在實際應用時的差異：

在秦代，小篆是主要字體，隸書只是一種新興的輔助字體，社會地位很低。「隸書」這個名稱就表示了它的身分。有人說隸書由於「施之於徒隸」而得名（《漢書·藝文志》），有人說隸書由於秦官府「令隸人佐書」而得名（晉衛恆《四體書勢》，見《晉書·衛恆傳》）。總之，隸書是上層統治階級所看不起的。秦代統治者允許官府用隸書來處理日常事務，是迫於形勢不得不然，並不說明他們喜歡或重視這種字體。在比較莊重的場合，一般是不用隸書的。⁴³

藝文印書館，1982，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雕版影印），冊 3，卷 40，頁 619-620。

41 吳旻旻，〈器物上的「新」面貌：王莽時期度量衡、銅鏡、錢幣的文化觀察〉，《臺大中文學報》，56 期（2017.3），頁 15。

42 吳旻旻，〈器物上的「新」面貌：王莽時期度量衡、銅鏡、錢幣的文化觀察〉，頁 16-17。

43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91。

雖然新莽時期的上層階級未必如秦人般「看不起」隸書，但「比較莊重的場合，一般是不用隸書」之說法仍十分合理。

從實物來看，新嘉量之篆書銘文結構嚴謹、筆畫工整，其用心程度更勝秦權量、詔版。比較兩者銘文內容也可見製作動機與目的明顯有別。秦權量銘：「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則不壹歟疑者，皆明壹之。」⁴⁴ 僅為單純之告示敘述。相較之下，新嘉量銘使用工整之四字韻文，即是周代金文常見的句式傳統。⁴⁵ 首句「黃帝初祖，德帀於虞。虞帝始祖，德帀於新」彰顯其正統繼承地位；「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記錄改朝換代的時間，藉由戊辰與「土」的連結，再次強調「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於五德終始說的神聖性。⁴⁶ 顯示其意圖已超越效法秦始皇於度量衡器上刻銘詔令之作法，乃是透過器物展示權力，欲再現周代古制與理想政治秩序之宏大野心。

王莽雖無法重現西周金文肅穆莊嚴的字形樣式，但對西漢末年之人而言，小篆尚為可掌握的「古體文字」。故小篆與繆篆在漢代雖不能等同於「古文」，其所承載的替代性象徵意義，已於新嘉量銘文的書體運用中得到具體展現，成為聯繫復古理想與政治應用之書體表現實例。

總結而言，新嘉量此器物本身即蘊含多重層面的意義：其一，統合律、度、量、衡之制度知識，並以器物形制呈現天道秩序的宇宙觀；⁴⁷ 其二，以結構嚴謹、風格莊重的小篆字形為書體應用；其三，融入陰陽五德終始之學說，使器物具備神祕學層面意涵；其四，呼應《周禮·考工記》器物制度，以具體形式實踐復古的政治訴求。由此可見，篆書在此不僅是一種書寫形式，而是與神祕學、經學、政治權力相互交織的文化表現，亦可視為東漢安帝時期篆書石刻應用的重要先例。

44 容庚，《秦漢金文錄》（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111。句讀方式的整理與討論參見單育辰，〈始皇廿六年詔書「法度量則不壹歟疑者」補論〉，《中國文字》，新35期（2010.6），頁171-178。

45 新嘉量銘文：「黃帝初祖，德帀於虞。虞帝始祖，德帀於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沉。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韻腳：新、辰、民、真、人、遵、年等字兩漢皆屬真部。釋文見容庚，《秦漢金文錄》，頁369。

46 吳旻旻，〈器物上的「新」面貌：王莽時期度量衡、銅鏡、錢幣的文化觀察〉，頁16-17。

47 吳旻旻，〈器物上的「新」面貌：王莽時期度量衡、銅鏡、錢幣的文化觀察〉，頁17。

三、安帝時期石刻篆書再現的政治文化脈絡

從現存之石刻拓本與出土簡牘資料來看，文字由小篆逐漸隸變為西漢時期的古隸，再到東漢中期成熟的八分隸，是一個趨向實用化的過程。前述今文經文本之建立，確立了隸書作為正統書體的地位。雖有新莽在體制與思想上復古改革，使古文字再度應用於器物銘文，但隸書以其筆劃清晰、蠶頭雁尾的造型美感、書寫便捷之優勢，遂成為漢帝國通行的書體，至東漢永初時期已出現成熟的八分隸書石碑。然而，在隸書為主流的發展脈絡之中，永初至延光年間篆書石刻集中出現，呈現出一種有別於主流書體發展歷程的文化與象徵性功能。本文認為此一特殊的書法風格現象，與當權者個人之崇古傾向、東漢古文學派發展過程、許慎《說文解字》成書等因素密切相關，乃是政治與思想交互作用下的書體選擇。

從風格發展來看，西漢後期至東漢中期的石刻書體，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觀察。第一階段為西漢至新莽時期的古隸階段，此時石刻文字與簡牘書寫風格相近，字形尚未完全脫離日常書寫的率意感，整體視覺仍帶有竹簡書寫的特徵，如五鳳二年（前 56）〈魯孝王刻石〉（圖 4）、天鳳三年（16）〈萊子侯刻石〉（圖 5）等皆屬此類。

〈魯孝王刻石〉使用的文字近似於出土竹簡文字，如其中較為複雜的「鳳」、「魯」、「年」等字都可以在同時期之竹簡中找到相對應之字形。若將〈萊子侯刻石〉圖像反白並套色處理，可見其「行列界線」、「文字欹側」在視覺上與並排之竹簡相近，呈現出一種「把數條木簡直接刻在石面上」的效果（圖 6、7）。此時期的石刻藝術尚未能將隸書的造型從「較為率意的書寫」與運用在「正式銘刻書體」的兩種方式中區分開來，故文字的大小、寬窄不一，結構亦不均勻，線條本身提按的輕重對比也較為強烈。

第二階段為新莽至東漢初期的過渡時期，除古隸之外，繆篆亦被廣泛應用於石刻、墓門題記及器物銘文之中，⁴⁸ 此與前一節所論及新莽時期崇尚古學的風氣相關，如天鳳五年（18）〈鬱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題記〉（圖 8）、建武元年至十年頃（約 25-34）〈粘蟬縣平山神祠碑〉（圖 9）。當石刻內容與祭祀、喪葬等事務相

48 「繆篆」由秦小篆截彎取直演化而來，最大的特徵在於「繆密盤繞而方正」，不似秦篆的圓轉長形，許慎謂之「所以摹印也」，故後世常誤會繆篆僅指出現於印章的字體，實則於石刻、銅鏡、磚瓦等物上所勒方形盤繞的篆體，均可謂「繆篆」之疇。

關聯時，對於漢人而言乃是隆重之事，終究需要解決視覺上需要的「莊重感」問題，不宜如竹簡書率意。〈粘蟬縣平山神祠碑〉內容記錄了建立山神祠的時間、地點與四字韻文祝禱詞，故篆書實為此類石刻應用上相當理想的表現形式。

在此一發展過程中，繆篆所扮演的過渡角色尤為關鍵。相較於古隸仍保留較多書寫者的個人習慣，繆篆以其方正、盤繞而緊密的結構，使書丹者逐漸脫離簡牘書寫的習慣，轉而建立適用於石刻的穩定字形模式。此種結構不僅有助於在石刻大面積空間中形成整體穩定且莊重的視覺效果，也在實際書寫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影響書丹者對字形的掌握。如建武中元二年（57）〈何君閣道銘〉（圖 10）幾乎已無篆書字法，隸書結構與捺畫逐漸融入整體，遂形成由古隸向八分隸過渡的中介形式。由此觀之，繆篆不僅是小篆的一種變體，更在東漢石刻書體由率意走向莊重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前導作用。

第三階段為東漢中期八分隸發展成熟的階段，如永元元年（89）〈燕然山銘〉（圖 11）、元初二年（115）〈子游殘碑〉（圖 12）等作品，已具備行列整齊、結構扁平、左右開張及蠶頭雁尾等特徵。顯示石刻隸書已由早期的簡帛古隸樣態轉變為具有規範性的正式書體，且兩者均文辭優美，〈燕然山銘〉由班固（32-92）撰文，〈子游殘碑〉亦是四字韻文頌辭，可知八分隸在此際已能夠使用在莊重的場合。

然而，正當八分隸書體逐漸成熟並成為石刻主流時，永初至延光年間卻出現多件以小篆與繆篆為主體的石刻作品，如延平元年（106 後）〈袁安碑〉（圖 13）、⁴⁹元初四年（117）〈袁敞殘碑〉（圖 14）、元初四年（117）〈祀三公山碑〉（圖 15）、元初五年（118）〈李昭墓碑〉（圖 16）、延光二年（123）〈嵩山少室石闕銘〉（圖 17）、延光二年（123）〈嵩山開母石闕銘〉（圖 18）。

在此六件石刻作品中，唯有〈祀三公山碑〉以繆篆刻成。其整體文字結構以方折為主，但其中部分字形以及較長的斜畫或轉折處，則會以帶有弧度的圓轉曲線加以處理，使字形在方正平直的調性之中，增添圓筆的修飾趣味，進而豐富其

49 〈袁安碑〉可能與〈袁敞碑〉於同時期建立，碑中以諡號稱漢和帝為「孝和皇帝」，故可知此碑應立於漢和帝崩後，且此碑的形制、大小、碑穿位置與〈袁敞碑〉一致。文字的造型、寫法也高度吻合，故此碑與〈袁敞碑〉出自同一人書丹且同時期完工的可能性高。另有學者認為此碑是後世之人於〈袁敞碑〉出土後，依其風格所偽造。〈袁敞碑〉真偽較無爭議，故就風格而言，仍可並置討論。參見王家葵，〈漢袁安碑研究〉，《東方藝術》，2016 年 20 期，頁 92-109。

藝術層次，避免流於僵直呆板；〈袁安碑〉與〈袁敞殘碑〉的文字造型較為相近，整體字形修長，線條瘦硬有神。其筆畫在圓轉之中兼具方折，起筆與收筆亦可見圓筆、尖筆、斜筆等多種姿態變化；橫畫常呈現近似「ㄣ」形的弧線造型，表現出書寫者鮮明的個人風格，為漢代小篆石刻中極具特色的作品；〈嵩山少室石闕銘〉與〈嵩山開母石闕銘〉的小篆字形則較短，文字內部結構堆疊緊密，筆畫同樣呈現圓轉中帶有方折的特徵。由此可見，書丹者對小篆結構的均勻安排與字形掌握，皆具有相當高的素養。相較之下，〈李昭墓碑〉之字形結構成熟度顯然不如袁氏二碑與嵩山闕銘，整體以圓轉的曲線為主，但線條質感較為僵硬，毛遠明（1949-2017）指出：「『諱』、『掾』等字，結體篆法板刻嚴重，與漢篆雄渾爽利的風貌相去甚遠。且該碑問世即毀，且殘損嚴重，頗疑是偽刻。」⁵⁰

篆書在此時期重新出現於石刻之中，若僅見〈祀三公山碑〉一件繆篆作品，或許尚可解釋為立碑者個人審美趣味的選擇。然而，若立碑者所偏好的只是「方形」或「體勢緊湊」的書法審美傾向，則前述第二階段的〈何君閣道銘〉，或永平九年（66）〈漢鄱君開通褒斜道刻石〉，皆係可供取法的風格，且文字還更易於識讀。故〈祀三公山碑〉之「書體」使用繆篆，其動機應與〈何君閣道銘〉等帶有繆篆筆意的隸書石刻作品不同。另一方面，此時除了〈祀三公山碑〉之外，其餘五件皆為小篆石刻，雖然這些作品相較於秦代篆書刻石，已增添較多方折筆意與個人書寫習慣，但就風格意義而言，更重要的是：屬於小篆的圓轉體勢與曲弧線條，在此時期重新回歸於石刻應用，這顯然並非書體自然演變的結果，故應置於當時經學發展與政治文化背景之中加以考察理解。

承續上一節所論及經學發展，自西漢末以來，古文經學逐漸受到重視，並在王莽時期之復古政策中獲得菁英階層推崇。孫次舟（1913-2000）在〈論魏三體石經古文之來源並及兩漢經古文寫本的問題〉文中指出：

而平帝時代，適王莽當政，劉歆為副之秋。利祿之徒，逢迎莽、歆，爭習「古學」，以求上達，亦意中事。惟王莽志在篡位，因以「復古」為掩飾，力反漢室法令。即以經術而論，凡未得為博士之無名經師，莽皆徵用，而猥以為通知古意。……然此於無名經師之外，又大徵「異能之士」，純係

50 〈李昭墓碑〉，《中華石刻數據庫》<https://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4/chapter/1466551>（檢索日期：2026年5月13日）

政治作用，與劉歆校書時之求立《左氏傳》，大異其趣。此乃莽思篡位，因先以獎寵異材之手段，收買英異，欲借彼等之力，以為篡位之宣傳及掩飾。⁵¹

孫氏藉《漢書·儒林傳讚》中祿利之路的說法，推想王莽當時世人亦逢迎政策而習古學，不無道理，可備一說。王莽當時學風雜糅、不論今、古文經師、天文、讖緯諸學皆來者不拒，本就流行於西漢末年的陰陽、讖緯學說因而堂而皇之地進入帝國的思想主體中。此後所見，王莽偽造符瑞篡漢、光武帝（劉秀，前 5-57）以圖讖立國，都是在今、古文經、陰陽、讖緯諸說雜合的同一脈絡下形成的。

東漢建立後，雖以今文經學為主導，但古文之學並未消失，反而在學術體系中持續存在，並與今文經學形成並存的局面。其原因在於東漢政權本身乃仰賴地方豪強為基礎而建立，故在政治運作上對於帶有復古傾向的古文經學採取一定程度的容納與調和。《後漢書·光武帝紀》載建武二年（26）封功臣為列侯，今文經學博士丁恭（生卒年不詳）即以《禮記·王制》為據，主張封地不宜過廣，以維持「強幹弱枝」的大一統秩序。然而此今文經學立場，與世家豪族所傾向的復古政治理念及其所依附的古文經學之間，實存在牴觸。在此情況下，光武帝對豪強勢力採取遷讓態度，使古文經學得以在東漢初期的學術與政治結構中持續發揮影響，而未被今文經學完全排除。⁵²

此外，古文經的《左氏》亦曾「名義上」於光武帝時期短暫地進入學官，⁵³《後漢書·儒林列傳上》中亦描述光武帝「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

51 孫次舟，〈論魏三體石經古文之來源並及兩漢經古文寫本的問題〉，收入虞萬里編著，《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下冊，頁 790。

52 章權才，《兩漢經學史》，頁 237。

53 據《後漢書·陳元傳》：「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過詣闕上疏曰：『……。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適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謹，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見（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上冊，卷 36，〈陳元傳〉，頁 443-444。

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⁵⁴

當中有今文家也有古文家，此一場景，實與《漢書·王莽傳》中廣蒐各地經書、號召四方學者的紀錄十分相似。以上的這些資料，也說明古文經之學如何在東漢初期得以延續。

漢代經學的整體發展，最初因秦燔六經而仰賴於口傳系統，武帝時逐漸蒐集、建立文字文本；西漢末新莽時的古今文、讖緯雜揉；再到光武帝為穩定世家豪族而對於古、今文兩家的兼容，以及本人以圖讖立國，篤信讖緯之故，東漢初的經學依舊是混雜的狀態。若古文、今文、讖緯這三種詮釋經學的系統長期沒有得到統合，對於政權內部的思想秩序將有不利影響，故章帝（劉炟，57-88）於建初四年（79）召開白虎觀會議，旨在整合儒學內部，由帝王作為統一解釋經學三大系統的思想領導者，林聰舜在〈帝國意識形態的重建——扮演「國憲」基礎的《白虎通》思想〉文中對此過程已有詳實之論；《後漢書·賈逵傳》中亦有對於章帝重視古學的記載，於此不再贅述。⁵⁵

此三種經學詮釋系統得以統合之後，則需要轉向處理太學學風的問題。徐防（約 46-115）於永元十四年（102）針對太學學風提出了策問改革建議：

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爭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⁵⁶

可見這項改革旨在統一經學詮釋之文本、義理，對「用於策問的文本」之校勘等標準化工作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進而促成永初四年（110）的東觀校書活動：

54（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下冊，卷 79 上，〈儒林列傳上〉，頁 908。

55 分見林聰舜，《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頁 213-261；（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上冊，卷 36，〈賈逵傳〉，頁 444-446。

56（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上冊，卷 44，〈徐防傳〉，頁 537。

我們若以中長時段的變化為標準，以章和時期為界探考文獻，大略即可推斷出章帝、和帝時期太學策問改革對東漢經學學術形態產生的影響。以下三個方面，或值得陳述。其一是經書文本的標準化，即對各經文本文字的校勘和統一……。東漢時代由王朝主導的校定經文，始於馬融所參加的漢安帝永初四年（110）東觀校書。《後漢書·安帝紀》曰：「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這是永元策問改革之後的第八年。⁵⁷

此即是延續前面所見石刻風格變化，在永初至延光年間，篆書書體密集應用於石刻之重要前導因素之一。

漢安帝十二歲即位（106），由鄧太后（鄧綏，81-121）聽政，東觀校書時安帝僅年十六，故有關於校書之號令，實由鄧太后主導。據《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所載，鄧氏自幼即對於經史典籍展現極高的天分與興趣：

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⁵⁸

於聽政後，日理朝政，夜讀文獻：

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迺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讐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⁵⁹

可知校書東觀的緣由，除了東漢初的古學風氣、中期策問改革之文本需要，執政者本身對於典籍的喜好也是重要因素。由這一個歷史背景發想，此亦如祿利之路說，上有所好者，下必甚焉。許慎之作《說文》，除了他本身的興趣與師承賈逵

57 徐建委，〈鄭玄的出現：永元改革與漢代學術型態之變遷〉，《文史哲》，2022年1期，頁57-58。

58（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上冊，卷10上，〈和熹鄧皇后紀〉，頁160。

59（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上冊，卷10上，〈和熹鄧皇后紀〉，頁162-163。

(30-101)「修理舊文，殊藝異術」之背景外，⁶⁰ 古文篆籀之學在當時的學者之中，應非冷門學問。由其子許沖（生卒年不詳）〈進《說文解字》表〉文中可見許慎曾為東觀校書成員之一：

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齎詣闕。⁶¹

又據《後漢書·儒林傳下》中所載，知許慎與同為東觀校書成員之一的馬融（79-166）交好：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⁶²

一般認為《說文》之草稿約成於永元十二年（100），永初四年（110）其書初成，又經十餘年之努力，於建光元年（121）完成並由許沖獻上朝廷。⁶³ 由以上數則記載，可知《說文》撰寫之起始時間早於東觀校書，且進入校書之歷程也應對其書之修訂增補有所助益。其古文字學的知識也與其他的校書者相互流通，並能教學宮人。

綜上所述古文學之發展歷程、統治者之崇古傾向以及《說文解字》之成書背景，可知〈袁安碑〉、〈袁敞殘碑〉、〈祀三公山碑〉、〈李昭墓碑〉、〈少室石闕銘〉、〈開母石闕銘〉等數件以小篆或繆篆為書體之石刻，乃密集出現於永初至延光年間的特定文化與政治語境之中。進一步觀察其立碑者與相關人物，亦可發現多與當時政權核心存在密切關聯，除〈李昭墓碑〉屬私墓性質外，袁安（?-92）、袁敞（?-117）皆位至三公；〈少室〉、〈開母〉二銘之監造者朱寵（生卒年不詳）當時的官職為「潁川太守」，然其與安帝朝鄧氏集團關係密切，實難視為普通地方首長，⁶⁴ 其所監造之嵩山三闕銘文中還可見多位官員聯署。由此觀之，實非單純的

60（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792。

61（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794。

62（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下冊，卷79下，〈儒林傳下〉，頁924。

63 黃天樹，《說文解字通論》，頁2-3。

64 據《後漢書·鄧騭傳》所載，朱寵早年即入鄧騭（?-121）幕府，後於建光元年（121），鄧太后崩，安帝親政，其乳母王聖（生卒年不詳）弄權，鄧氏兄弟受宮人誣陷，鄧騭無故被遣，帶著兒子絕食而死。朱寵時任大司農，為其上書申冤，雖因此罷官歸里，然至順帝（劉保，115-

地方祭祀活動，應置於帝國政治運作之脈絡中加以理解。

至於〈祀三公山碑〉記載：「元初四年，常山相隴西馮君到官」，⁶⁵ 監造者馮氏雖未詳其名字，但由其後續碑文：「承饑衰之後，深惟三公御語山，三條別神，迺在領西。吏民禱祀，興雲膚寸，偏雨四維」可知祭祀目的為祈雨。⁶⁶ 又由「三條別神，迺在領西」可上溯《尚書·禹貢》分導山為三條之記載，⁶⁷ 顯示其祭祀對象具有儒學正典的神聖性，或與夏禹（生卒年不詳）有關連，禹為「山川神主」，故非一般地方層級信仰。⁶⁸ 綜合而言，這些篆書石刻所聯繫之人物、事件與祭祀內容，皆與當時帝國政治權力核心、經學實踐及治理需求緊密相關，亦進一步說明篆書之使用，並非隨機的書體選擇，而是在特定政治文化脈絡下所形成的運用。

四、作為符瑞器物的篆書石刻：書體於讖緯語境中的政治意涵

承上節所論，永初至延光年間篆書石刻的集中出現，與東漢古學發展及政治因素密切相關。若再進一步觀察石刻的文本內容與使用情境，則可發現篆書多見於祭祀、符瑞等特定場合，透過書體的選擇，將政治治理與意識形態的需求形之於器物。在安帝時期建立的篆書石刻中，除〈袁安碑〉、〈袁敞碑〉、〈李昭墓碑〉等紀人、私墓性質之作品外，⁶⁹ 其餘石刻與神靈祭祀、祥瑞紀錄之讖緯語境密切相

144) 時復被擢用為太尉，足見其政治地位與影響力。見（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上冊，卷16，〈鄧騭傳〉，頁230-233。

65 常山原名恆山，因避漢文帝劉恆諱改稱常山。

66 毛遠明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北京：線裝書局，2009），冊1，頁93。

67 《尚書·禹貢》：「導岷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見（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板橋：藝文印書館，1982，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雕版影印），冊1，卷6，頁87。

68 《史記·夏本紀》：「天下皆宗禹之明德數聲樂，為山川神主。」見（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史記》，冊1，卷2，〈夏本紀〉，頁55。

69 由〈袁安碑〉、〈袁敞碑〉之文辭與石刻形制來看，二者很可能不屬於一般認知的紀念碑或墓碑，而是一種祭祀用途之碑。袁敞因「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之後朝廷「薄敞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然觀袁氏二人碑文，僅是對生平之輕描淡寫，不似紀念、紀功性質。兩碑正中皆有大型「碑穿」，碑穿亦非「紀功碑」或「紀事碑」常見之形式。楊頻在〈圖像與真相：漢碑「穿」、「臺」含義新探〉文中考據了漢代墓葬、畫像石的圖像組合，認為漢代有以四靈獸結合玉環，應用於引導靈魂、精氣穿行陰陽兩界之象徵傳統，故碑穿本身實為帶有神秘學意義的設計：「祭祀碑因為面對人或神的魂靈，所以應該要有圓孔；而紀功德政碑因為歌頌活著的人，便不能帶有這一象徵靈魂穿行的神秘圓孔。」袁氏父子雖非神格，二碑不能視為一種祥瑞器物，但由其形制可見此時期朝廷重臣之祭祀碑碣亦可能融合了神

關。本節將視角從書法風格與政治文化背景轉向考察石刻的實際應用功能，探討篆書如何在災異頻發、讖緯盛行的時代中，被選擇為祭祀與祥瑞石刻的書體，並藉由這些石刻所承載的神秘象徵，以維繫災亂之下的政治統治秩序。

於此將前（表一）中類型屬於神靈祭祀、符瑞紀錄碑文之祝禱詞、描述讖緯祥瑞之語錄於下（表二）：

表二 東漢篆書石刻之祝禱詞與讖緯祥瑞描述

石刻名稱	建立時間(西元)	字體	祝禱詞內容
粘蟬縣 平山神祠碑	約 25-34 年	繆篆	惟平山君，德配代嵩。承天出□，□佑粘蟬。興甘風雨，惠潤土田。□□壽考，五穀豐成。盜賊不起，□蟄□臧。出入吉利，咸受神光。 ⁷⁰
祀三公山碑	117 年	繆篆	元初四季，常山相隴西馮君到官。承饑衰之後，深惟三公御語山，三條別神，迺在領西。吏民禱祀，興雲膚寸，偏雨四維。遭離羌寇，蝗旱鬲并，民流道荒。醢祠稀罕，徹奠不行。 由是之來，和氣不臻，乃求道要，本祖其原。以三公惠廣，其靈尤神。處幽道艱，存之者難。卜擇吉土治東，就衡山起堂立壇，雙闕夾門，薦牲納禮，以寧其神。 神熹其位，甘雨屢降，報如景響。國界大豐，穀升三錢。民無疾苦，永保其季。 ⁷¹
嵩山 少室石闕銘	123 年	小篆	〈少室石闕銘〉之碑文前半漫漶嚴重，據毛遠明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中可見前半段的內容，有一小段釋文： ……□□清遠□□□木連理長於□□□…… ⁷² 由「木連理」可以推測亦是描述符瑞的文字。 後半段文字可辨的部分，是記錄日期與立碑官員名單。於石刻之末後有〈蟾蜍玉兔搗藥圖〉（圖 21），亦屬於漢代之祥瑞圖式。 ⁷³

祇祭祀碑所具有的宗教象徵元素。袁氏二人皆位至三公，又朝廷欲薄啟罪而隱其死，故其碑碣本體應不致於粗製濫造。而其碑文內容、形式之單薄無飾，應是多方權衡之後的結果。加上「碑穿」的設計後，整體呈現出一種無關乎個人紀念的「象徵性祭祀用途」。此類碑碣或已遠離傳統墓碑與功德碑的範疇，成為一種承載政治需求與君臣倫理用途的碑刻。參見楊頻，〈圖像與真相：漢碑「穿」、「暈」含義新探〉，《美術大觀》，2023 年 3 期，頁 89-91；（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上冊，卷 45，〈袁敞傳〉，頁 545-546。

70 毛遠明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冊 1，頁 32。

71 毛遠明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冊 1，頁 93。

72 毛遠明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冊 1，頁 108。

73 顧穎指出：「蟾蜍還常常出現在月亮中，有時候會單獨在月亮裡，有時候會和玉兔一起。蟾蜍的外形是醜陋的，甚至有毒，因為它的背疣分泌物有毒，但在漢代人的眼裡，蟾蜍的背疣並不穢惡，還可以治病，甚至能助人升仙，是靈藥和神物的結合。正如漢畫裡，太陽中會有三足

石刻名稱	建立時間(西元)	字體	祝禱詞內容
嵩山 開母石闕銘	123 年	小篆	昔者共工，範防百川。柏鯀稱遂，□□其原。洪泉浩浩，下民震驚。禹□大功，疏河寫玄。九山甄旅，咸秩無文，爰納塗山，辛癸之間。三過亡入，寔勤斯民。同心濟隄。百川是正。杞繒漸替，又遭亂秦。聖漢禋亨，於茲馮神。瞞彼飛雉，埒於其庭。貞祥符瑞，靈支挺生。陵谷嚮化，陰陽穆清。興雲降雨，□□□盈。守□不歇，比性乾坤。福祿來飯，相肩我君。千秋萬祀，子子孫孫。表碣銘功，昭眡後昆。□□□□延光二年。重曰： □□□以作辟，惠洋溢而溥優。□□□□為政，刪文耀以消搖。□□□□時離，皇極正而降休。□□□□□穎，芬茲楸于園疇。□□□□□閉，木連理於芊條。□□□□□盛，昨日新而累熹。□□□而慕化，咸來王而會朝。□□□其清靜，九域尖其脩治。□□□□祈福，祀聖母摩山隅。神禋亨而飴格，釐我后以萬祺。于胥樂而罔極，永歷載而保之。⁷⁴

由文辭來看，這些碑文的內容不外乎祈求「風調雨順」並表達對所祀神祇之讚頌，透過四言韻文、祥瑞文字、圖式，與小篆書體之聯繫結合，形成完整且俱備宗教儀式性的石刻作品。

考察客觀的歷史紀錄，王文濤在〈東漢安帝朝自然災害與政府賑災年表〉中對於此時期之自然災害情況作出統計：

東漢 196 年間，發生自然災害 372 次（不包括饑荒），自然災害頻度為 0.53 年 1 次。……從和帝時起，自然災害開始增多，進入高發期，至安帝達到高潮，靈帝時逐漸減少。……漢安帝在位的 20 個年頭不僅無年不災，而且一年數災。共發生自然災害 86 次，約佔東漢災害總量的 23%。⁷⁵

應是此期間建立數則祭祀碑文之最主要的原因。漢人迷信天人感應、災異諸說，讖緯學說具體化應用之「祥瑞」與現實世界發生的各種「災異」往往是一體兩面的，災亂動盪之時亦多祥瑞紀錄，欲藉祥瑞之名行維護政局之實。故王莽、光武

鳥，月亮裡常常會有蟾蜍，漢人甚至把它當作嫦娥的化身。」見顧穎，《漢代讖緯與漢畫像祥瑞圖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頁 179-180。

74 毛遠明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冊 1，頁 104。

75 王文濤，〈東漢安帝朝自然災害與政府賑災年表〉，《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07 年 3 期，頁 33-37。

帝能以假造的符瑞奪權，可見這種神秘學力量在漢代人的精神層面具有非常強烈的影響力。

王葆玆（1946-2023）在《西漢經學源流》書中曾指出：「讖緯合起來，在新莽和東漢時的地位一定超過西漢經學家的任何著作，甚至可能超過五經。」⁷⁶ 林聰舜承王氏說，進一步指出這個時期的讖緯符命帶有強烈的「預言性」以及對於政權的「顛覆性」，但對朝廷而言卻無法捨棄其用來控制思想與政治宣傳之便利層面：

如何藉著大眾信服的讖緯之學的說服力，推銷三綱五常等擁護體制的觀念，並剔除讖緯中顛覆性的成分，才是白虎觀會議必須面對的課題。⁷⁷

故在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之後，帝王掌握了對於符命、祥瑞的解釋與使用權：

《白虎通》中的災異符命思想都針對天子而言，天子壟斷了符命祥瑞，而且對君主的神化，較讖緯集中、具體，也是反映了當時統治階級的需要。⁷⁸

由《白虎通·封禪》中的文字：「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⁷⁹ 則可知係因帝王受命於天，德性與天道相感，所以才有各種瑞兆出世。由此對照〈祀三公山碑〉：「神熹其位，甘雨屢降，報如景響。國界大豐，穀升三錢」；〈嵩山開母石闕銘〉：「聖漢禋享，於茲馮神。睟彼飛雉，峙於其庭。貞祥符瑞，靈支挺生。陵谷鬻化，陰陽穆清。興雲降雨……。」這些祝禱詞不僅是於對神靈的歌頌，更是呼應《白虎通》帝國意識形態的重要宣傳方式。因為「聖漢禋享，於茲馮神」，所以「貞祥符瑞，靈支挺生」，藉由祥瑞的書寫，將祭祀活動與漢室德政、天人感應觀念相互結合。安帝年間頻發蝗、旱、水災、地震、風災、瘟疫等大型自然災害，地方首長領眾登山祭祀祈求風調雨順，建立記錄著各種祥瑞事物的石刻，即是呼應帝國意識形態所需，穩定社會的強勁力量。

從功能上看，這些石刻本身不僅是祝禱詞的載體，其整體已然成為了一

76 王葆玆，《西漢經學源流》（臺北：東大圖書，1994），頁392。

77 林聰舜，《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頁229。

78 林聰舜，《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頁231。

79 （漢）班固撰集，（清）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上冊，卷6，〈封禪·論符瑞之應〉，頁283。

種「符瑞器物」，而「篆書」即是配合製作這一類符瑞器物之理想書體。由文辭的敘述方式分析，永初至延光年間這些祭祀或符瑞石刻並非如東漢中晚期那些用於「宣傳」的石碑，而是針對所祭祀之神祇而建立，文辭之受讀者為神祇而非直接面向群眾。對於山岳之神或古代傳說人物以古文篆字刻錄祝禱詞，理應較今文隸書更為合適。此外，篆書本身的圖像與符號特徵比隸書更原始、更具神秘色彩，適合與祭祀、符瑞應用結合。

由《論語·子罕》：「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⁸⁰可見具有神秘色彩的想像動物、器物在上古社會與理想化的政治治理存在緊密連結，孔子亦盼望著「有鳳來儀」、「河圖再現於世」。古人對於《河圖》、《洛書》的紀錄文字亦即反映了「符瑞器物的想像原型」，由各類緯書所記載的樣式來看，符瑞器物往往是「圖文並存」的。如《孝經援神契》：「奎主文昌，倉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⁸¹與《尚書中候》：「河龍出圖，洛龜書威，赤文綠字，以授軒轅。麒麟在囿，鸞鳥來儀。」⁸²可見在漢代人的想像中，古代文字之形成與「圖書」存在聯繫。又如《春秋運斗樞》：

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堯入水而前去。圖以黃玉為匣如櫃，長三尺，廣八寸，厚一寸，四合而連，有戶。白玉檢，黃金繩，紫芝為泥，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五字廣袤各三寸，深四分，鳥文。⁸³

以及多種記錄符瑞器物的文字可見，這些讖緯書的作者對於器物的形制提供了鉅細靡遺的描述。也就說明，即便是神話傳說中虛構的物件，在漢代人的心目中仍依循著某一種理想樣式被傳頌著。「天黃帝符璽」以「璽印」與「鳥文（想像中的上古文字）」的形式象徵上天授予的權力器物，與本文前引王靜芬所謂「青銅器與石碑象徵權力」、「王莽依周制造嘉量並以篆文銘刻」實是同一概念，乃是一種製作符瑞器物以展現政權的方式。

王利器（1912-1998）在〈讖緯五論〉文中整理了「圖」與「緯書」的題名關

80（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129。

81（漢）佚名，《孝經援神契》，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緯書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冊，頁1019。

82（漢）鄭玄注，《尚書中候》，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緯書集成》，下冊，頁1194。

83（漢）佚名，《春秋運斗樞》，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緯書集成》，上冊，頁950。

係，進一步指出：

蓋識緯之類，圖文並茂，以便觀覽，陸士衡所謂「宣揚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亦古書舊式之一端，……後世由圖緯派生之〈推背圖〉、〈燒餅歌〉之類，猶繼承這一傳統，插有彩色繪圖。⁸⁴

並由前述各類緯書文獻可知，人們將「圖像」與「古文字」同時應用於符瑞器物的紀錄與製造，應是自古以來的傳統。

此外，略考「符瑞」二字之本義，與「信」、「節」、「璽」均相關聯，試舉許慎《說文解字》及段玉裁（1735-1815）對「符」、「瑞」、「卩」等字之注釋：

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段注〕：《漢孝文紀》：「始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云：「銅虎符一至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至都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⁸⁵

瑞，以玉為信也。〔段注〕：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又云：「瑞，節信也。」說文卩下云：「瑞信也。是瑞、卩二字為轉注。」……引伸為祥瑞者，亦謂感召若符節也。⁸⁶

卩，瑞信也。〔段注〕：瑞者，以玉為信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⁸⁷

並由現今所見出土竹節、虎符、璽印，文字均為篆書，故應用於識緯符瑞之文字，以古文篆字作為書體是十分合理的。

進一步由實物來看「篆書書體」與「符瑞器物」應用結合之論，可援漢代的「瓦當」為例，如〈維天降靈瓦當〉與〈飛鴻延年瓦當〉兩件拓片（圖 19、圖 20），與〈少室銘〉末後之〈蟾蜍玉兔搗藥圖〉（圖 21）皆屬於祥瑞圖式結合篆書於同一器物之應用方式。「瓦當」本為中國傳統建築中，覆蓋屋簷端點的瓦片，呈圓形，具有擋住後方瓦片、保護檐頭及裝飾等作用。瓦當圖樣多為祥瑞動物或吉

84 王利器，《曉傳書齋文史論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頁 86。

85（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 193。

86（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 13。

87（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 435。

語，可知其具有「趨吉避凶」之一層意義，且瓦當文字亦以篆書較隸書更為常見。

在〈維天降靈瓦當〉中可見四周有曲線裝飾，屬「連理枝」祥瑞圖式之簡化版本，形式上與〈四川梓潼畫像磚〉上面的木連理畫像相似，⁸⁸並有小篆「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之吉語。〈飛鴻延年瓦當〉之飛鴻亦屬祥瑞圖式，合以繆篆「延年」二字。「少室山」在識緯書中與「大竹林」、「靈藥登仙」等傳說相關，與所刻之〈蟾蜍玉兔搗藥圖〉同為追求長生之故事題材。⁸⁹類似的圖樣在漢代瓦當及銅鏡中相當常見，在此不逐一窮舉。由這些實物可知，「篆書」與「祥瑞圖式」經常同時應用在器物之上，篆書也是「吉語」的主要書體表現形式，本身具有趨吉避凶的一層內在意義。

除了實物作為例證，本文（表一）所舉〈麒麟鳳凰碑〉是一則存於文獻中的重要案例。〈麒麟鳳凰碑〉之原石、原拓今已不傳，文字記載見錄於北宋趙明誠《金石錄》、南宋洪适《隸釋》等文獻之中。

《金石錄》記之為「漢麟鳳贊并記」：

右漢麟鳳贊，其上刻麟鳳像，各為贊附於下。文別有記云：「永建元年秋七月，山陽太守河內孫君新刻瑞像麟鳳。」最後有銘，銘凡五句，句九字。按《漢史》，安帝時頻有鳳皇、騏驎之瑞，而順帝永建中則無之，不知孫君刻此碑何謂也。⁹⁰

《隸釋》中補充了碑文，記之為「山陽麟鳳碑」：

又有山陽麟鳳碑，二物共一石，其像小於此碑。像下有贊云：「天有奇鳥，名曰鳳皇。時下有德，民富國昌。黃龍嘉禾，皆不隱藏。漢德巍巍，分布宣揚。」又云：「天有奇獸，名曰麒麟。時下有德，安國富民。忠臣竭節，義以脩身。闕愆采善，明明我君。」碑陰有記云：「永建元年，山陽太守河內孫君新刻瑞像。」最後有銘辭，皆篆文也。胡承公云：「其石兩旁有隸書，六十九字。」趙氏但得其篆，予所藏亦然。⁹¹

88 參見顧穎，《漢代識緯與漢畫像祥瑞圖式研究》，頁197-199。

89 黃復山，《東漢識緯學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頁127-128。

90（宋）趙明誠撰，《宋本金石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328-329。

91（宋）洪适撰，《隸釋·隸續》（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69-170。

由洪适《隸釋》可知此碑之銘辭為篆書，胡世將（字承公，1085-1142）所謂「兩旁有隸書」可能是記錄此碑出資、建造之相關人員（漢碑常見的記錄方式）。可見一塊石碑之中存在篆、隸兩種字體，被選擇應用於不同的文本類型，篆書與讖緯符瑞相關（神秘學的），隸書則為了記錄建立過程（人間世俗的）。

趙明誠於《金石錄》中據史書所載安帝在位期間常有鳳凰、麒麟之瑞，而順帝永建中則無之，提出「不知孫君刻此碑何謂」之疑問。詳查《後漢書·安帝紀》可見通篇充斥著各種天災戰亂，文中最初有關於祥瑞的敘述為：安帝在位中期之元初三年（116），「東平陸上言木連理」。此後亦災、戰頻繁，各地上報之祥瑞紀錄也明顯增加。延光初年（122）有「九真言黃龍見無功」，二年（123）有「九真言嘉禾生」，至三年（124）有「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⁹² 此次之祥瑞回報更獲得賞賜：「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皇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田租。」⁹³

賞例既成，各郡官吏群起效尤，同年七月有「甘露降頻陽衙」、「潁川上言木連理，白鹿、麒麟見陽翟」；八月「潁川上言麒麟一、白虎二見陽翟」；九月「濟南上言黃龍見歷城」；十月「新豐上言鳳皇集西界亭」；十二月「琅邪言黃龍見諸縣」；延光四年（125）正月有「東郡言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⁹⁴

在這些紀錄之中，與嵩山篆書石刻最為重要的聯繫即：朱寵時任潁川太守，《後漢書》中發生於潁川的這些祥瑞紀錄應為朱寵所上報。⁹⁵ 陽翟乃傳說中夏禹建國之都，「山川之神」所在之地有祥瑞現世，即呼應當時天災頻繁，安撫群眾所需之讖緯祥瑞，〈嵩山開母石闕銘〉之內容亦為讚頌夏禹和啓母，充分顯示其配合帝

92（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上冊，卷5，〈安帝紀〉，頁104-107。

93（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上冊，卷5，〈安帝紀〉，頁107。

94（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上冊，卷5，〈安帝紀〉，頁107-108。

95 據《後漢書·鄧騭傳》：「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騭府，稍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及拜太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擢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開母廟銘〉建於延光二年（123），刻有「時太守京兆朱寵……」。順帝於125年12月即位，可推知此時朱寵尚在潁川任太守。參見（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上冊，卷16，〈鄧騭傳〉，頁233；嚴耕望輯，《兩漢太守刺史表》（臺北：商務印書館，1948），頁122、125。

國意識形態與政治宣傳之動機。此外，〈麒麟鳳凰碑〉建於山陽郡，地理上與濟南鄰近。《後漢書·安帝紀》中自 116 年至 125 年間頻見祥瑞紀錄，〈祀三公山碑〉、〈嵩山少室石闕銘〉、〈嵩山開母石闕銘〉之建立亦同在此段期間。

詳閱《後漢書·安帝紀》還可見到這些密集假造的祥瑞事件幾乎都接續在各地頻發之災亂文字之後，災異後有祥瑞見，形成了一種弔詭的文字記錄方式，欲假祥瑞之名行維護政局之實。且各地官員奉承阿諛之心態表露無遺，可知永建元年（126）所建立的〈鳳凰麒麟碑〉銘辭：「時下有德，安國富民。忠臣竭節，義以脩身。闕愆采善，明明我君」同樣是承續了這種諂媚風氣而「精心偽造的祥瑞器物」。

最後，就「紀人」與「符瑞」兩類石刻的篆書風格而言，袁氏二碑與〈少室石闕銘〉、〈開母石闕銘〉皆以小篆書寫，二者均呈現出對小篆文字相當成熟的掌握與運用能力，刻工亦頗見講究。嵩山石刻雖因風化殘蝕，已較難辨識其初始筆畫樣貌，但仍可透過袁氏二碑的筆畫細節，觀察到當時刻工對書法筆意的細膩呈現。由此可知，這些石刻的書寫與製作，應非一般市井匠人所能獨立完成，而有朝中知識分子參與其中，是知識階層有心推動的結果。

透過以上對石刻文本內容的分析，結合瓦當圖像樣式、〈鳳凰麒麟碑〉文獻的對讀，並考察《白虎通》、緯書記載與「符瑞」文字本義，再對照《後漢書·安帝紀》自 116 年以後大量的災異與祥瑞紀錄，即可將〈祀三公山碑〉、〈嵩山少室石闕銘〉、〈嵩山開母石闕銘〉與〈鳳凰麒麟碑〉等作為符瑞器物的篆書石刻，置於經學發展、政治治理、文化脈絡的視野中觀照。這些石刻中篆書的選擇乃是一種與祭祀、符瑞等神祕學應用密切相關的政治操作，成為一種服務於政治需求並展示帝國權力與意識形態的「符瑞器物」。

五、結語

總結全文，將永初至延光年間特有的篆書石刻置於書體演變、經學發展與政治文化交涉的脈絡下加以審視，可發現這些石刻並非偶然的創作，而是當時思想與政局的複合現象。從「書體」的角度而言，東漢安帝時期的隸書石刻雖已完成「隸變」過程，八分隸逐漸成熟普及，但此一趨勢並未撼動篆書的文化功能。篆書以其圖像性強、文字古雅而富神秘色彩，於識緯應用中仍為不可取代的象徵性符

號。特別是在安帝年間災疫頻發、政局動盪、神秘學盛行的背景之下，篆書所具有的「高古」、「神秘」特質，恰好可與政治上符瑞器物之製作與宣傳需求結合，進而被選擇應用於神靈祭祀、祥瑞石刻之上。

至東漢中晚期，篆書逐漸退出碑文主體，轉而應用於碑額題署。至三國魏之〈三體石經〉，篆書重新以「經學正典」之姿出現，之後於東吳〈天發神讖碑〉與〈封禪國山碑〉中，與讖緯符瑞之應用再度結合登場。由此可見，篆書的風格選擇、類型繼承與其所服務的思想、政治目的，直至三國時期仍舊緊密交纏。故知書體不僅僅為石刻之視覺形式，而能於形式之中傳達政治、時代思想，於往後的朝代尚有許多論述之可能性，願能藉此文以初窺一隅。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
-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漢)班固撰集，(清)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2016。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3，板橋：藝文印書館，1982，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雕版影印。
-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 (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1，板橋：藝文印書館，1982，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雕版影印。
- (宋)洪适撰，《隸釋·隸續》，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宋)趙明誠撰，《宋本金石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
-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緯書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近代論著

- 丁瑞茂編，《小學之道——從漢簡看漢代識字教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
- 毛遠明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北京：線裝書局，2009，冊1。
- 王文濤，〈東漢安帝朝自然災害與政府賑災年表〉，《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3期，頁33-37。
- 王利器，《曉傳書齋文史論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 王家葵，〈漢袁安碑研究〉，《東方藝術》，2016年20期，頁92-109。
- 王博玄，〈唐代以前經籍注解體裁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 王葆玆，《西漢經學源流》，臺北：東大圖書，1994。
- 王靜芬(Dorothy C. Wong)，毛秋瑾譯，《中國石碑：一種象徵形式在佛教傳入之前與之後的運用(Chinese Steles: Pre-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 吳旻旻，〈器物上的「新」面貌：王莽時期度量衡、銅鏡、錢幣的文化觀察〉，《臺大中文學報》，56期，2017年3月，頁1-46。

卓加眞，〈中國稗官與正史上的女性譯者〉，《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2 卷 2 期，2012 年 6 月，頁 41-54。

林惟仁，〈錢穆論兩漢今古文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9 期，2016 年 9 月，頁 163-200。

林聰舜，《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

夏長樸，《儒家與儒學探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4。

孫次舟，〈論魏三體石經古文之來源並及兩漢經古文寫本的問題〉，收入虞萬里編著，《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下冊，頁 781-830。

容庚，《秦漢金文錄》，北京：中華書局，2012。

徐建委，〈鄭玄的出現：永元改革與漢代學術型態之變遷〉，《文史哲》，2022 年 1 期，頁 48-63。

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章權才，《兩漢經學史》，臺北：萬卷樓，1995。

單育辰，〈始皇廿六年詔書「法度量則不壹歎疑者」補論〉，《中國文字》，新 35 期，2010 年 6 月，頁 171-178。

華人德，《中國書法史·兩漢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

黃天樹，《說文解字通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黃復山，《東漢讖緯學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黃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增訂本）》，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楊頻，〈圖像與真相：漢碑「穿」、「暈」含義新探〉，《美術大觀》，2023 年 3 期，頁 87-95。

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經學通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7。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1995。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吳秋野譯，《書跡：中國古代書法研究》，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23。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臺北：東大圖書，2023。

嚴耕望輯，《兩漢太守刺史表》，臺北：商務印書館，1948。

顧穎，《漢代讖緯與漢畫像祥瑞圖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角井博監修，《中國書道史》，東京：芸術新聞社，2009。

玉村霽山，《中國書道史年表》，東京：二玄社，2018。

網路資料

〈李昭墓碑〉，《中華石刻數據庫》<https://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4/chapter/1466551>，檢索日期：2026 年 5 月 13 日。

楊軍，〈口述與文本：兩漢經學今古文新議〉，《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5/t20230519_5639172.shtml，檢索日期：2025 年 2 月 11 日。

圖版出處

- 圖 1 (新莽)〈新嘉量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圖版取自「史語所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s://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_op?!!NO^44413030303032323333,檢索日期:2026年5月11日。
- 圖 2 (秦)〈廿六年詔十六斤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圖版取自「史語所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s://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_op?!!NO^4441303030303130343136,檢索日期:2026年5月11日。
- 圖 3 (秦)〈廿六年詔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圖版取自「史語所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s://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_op?!!NO^444130303030333393833,檢索日期:2026年5月11日。
- 圖 4 (西漢)〈魯孝王刻石〉。圖版取自「中華石刻數據庫」:<https://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4/chapter/1466486>,檢索日期:2026年5月13日。
- 圖 5 (新莽)〈萊子侯刻石〉。圖版取自「中華石刻數據庫」:<https://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4/chapter/1466497>,檢索日期:2026年5月13日。
- 圖 6 (新莽)〈萊子侯刻石〉,經電腦負片套色處理。圖版取自「中華石刻數據庫」:<http://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4/chapter/1466497>,檢索日期:2026年5月13日。
- 圖 7 (新莽)《武威新簡·儀禮甲本·土相見之禮》,局部,1959年7月甘肅省武威漢墓出土。圖版取自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編,《考古學專刊 乙種第十二號:武威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圖版壹,甲本土相見之禮。
- 圖 8 (新莽)〈鬱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題記〉,局部。圖版取自「中華石刻數據庫」:<https://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4/chapter/1466499>,檢索日期:2026年5月13日。
- 圖 9 (東漢)〈粘蟬縣平山神祠碑〉,局部。圖版取自「中華石刻數據庫」:<https://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4/chapter/1466500>,檢索日期:2026年5月13日。
- 圖 10 (東漢)〈何君閣道銘〉。圖版取自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冊1,頁100。
- 圖 11 (東漢)〈燕然山銘〉,局部。圖版取自「中華石刻數據庫」:<https://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4/chapter/1466516>,檢索日期:2026年5月13日。
- 圖 12 (東漢)〈子游殘碑〉,局部。圖版取自「中華石刻數據庫」:<https://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4/chapter/1466546>,檢索日期:2026年5月13日。
- 圖 13 (東漢)〈漢袁安碑墨拓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4 (東漢)〈袁敞殘碑〉。圖版取自「中華石刻數據庫」:<https://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4/chapter/1466548>,檢索日期:2026年5月13日。

- 圖 15 （東漢）〈東漢元初三公山碑拓〉，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MOCCOLLECTIONS&id=14000102569>，檢索日期：2026 年 5 月 19 日。
- 圖 16 （東漢）〈李昭墓碑〉，局部。圖版取自「中華石刻數據庫」：<https://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4/chapter/1466551>，檢索日期：2026 年 5 月 13 日。
- 圖 17 （東漢）〈漢嵩山少室石闕銘墨拓本 橫披〉，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8 （東漢）〈漢嵩山開母廟闕銘墨拓本 軸〉，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9 （漢）〈漢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瓦當墨拓 冊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0 （漢）〈漢飛鴻延年瓦當墨拓 冊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1 （東漢）〈漢嵩山少室石闕銘墨拓本 橫披〉後，〈蟾蜍玉兔搗藥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Script Style and Its Political Applications: Seal Script Inscriptions as Auspicious Artifact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An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Chiu, Wei-ting**

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study of “script styles” has been situated within the fields of philology, calligraphy history, and calligraphy aesthetics, and it has rarely been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rough historical sources,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Text and Old Text classical traditions. Beginning with the Qin dynasty’s book burning and prohibition policies, which l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Old Text manuscripts, oral transmission and the New Text tradition subsequently rose to prominence. By the late Western Han, Liu Xin’s advocacy of the Old Text classics, together with Wang Mang’s casting of the “Xin Jialiang” inscription in small seal script, demonstrates how “archaic script” became a symbol embedded in both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mystical discourse. This study further surveys the stylistic development of stone inscriptions from the late Western Han to the middle Eastern Han period, arguing that the concentrated appearance of seal script engravings during the Yongchu to Yanguang reign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vival of Old Text learning, the antiquarian preferences of ruling elite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huowen jiezi* text. These factors indicate that the choice of calligraphy script in stone inscriptions carried distinc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Finally, by examining engraved texts, roof tiles, and other related visual materials alongside apocryphal and prophetic writings, this study shows that seal script during this period was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ritual practices and auspicious omens. In response to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archaic script became intertwined with mystical thought and was materialized as an “auspicious object,” ser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needs of governance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Keywords: seal script, material culture, auspicious omens,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Han period, calligraphy history of the Han period

* Received: 11 August 2025; Accepted: 5 May 2026

** Ph.D. candidate and Adjunct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圖 1 新莽 〈新嘉量銘〉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2 秦 〈廿六年詔十六斤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3 秦 〈廿六年詔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4 西漢 〈魯孝王刻石〉



圖 5 新莽 〈萊子侯刻石〉



圖6 新莽 〈萊子侯刻石〉 經電腦負片套色處理



圖7 新莽 《武威新簡·儀禮甲本·士相見之禮》 局部 1959年7月甘肅省武威漢墓出土



圖8 新莽 〈鬱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題記〉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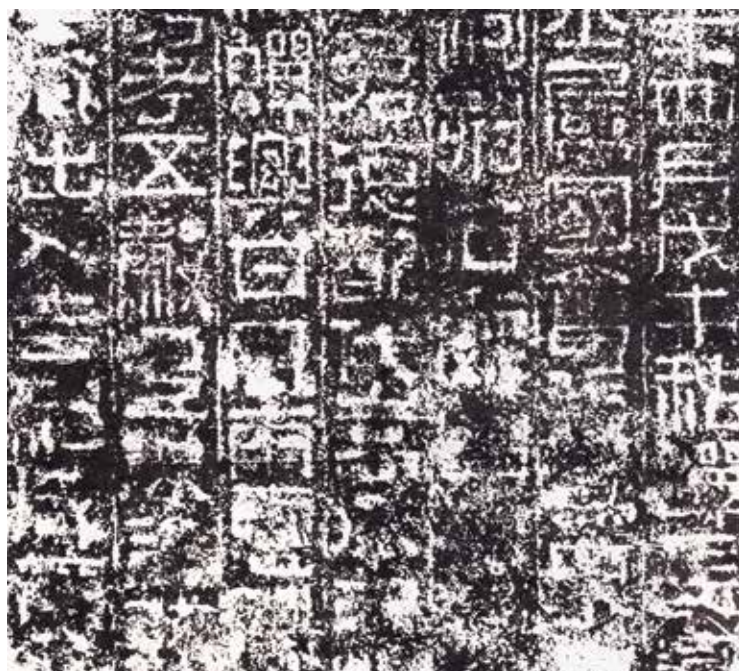


圖9 東漢 〈粘蟬縣平山神祠碑〉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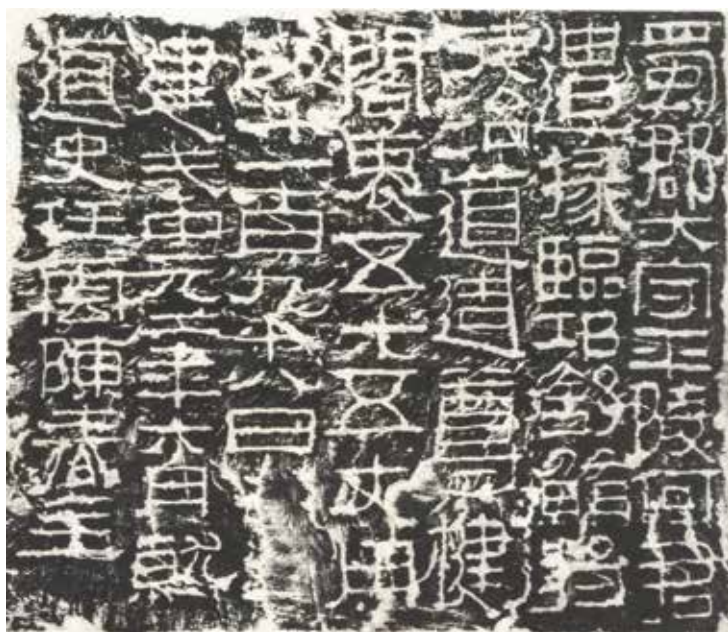


圖 10 東漢 〈何君閣道銘〉



圖 11 東漢 〈燕然山銘〉 局部



圖 12 東漢 〈子游殘碑〉 局部



圖 14 東漢 〈袁敞殘碑〉



圖 13 東漢 〈漢袁安碑墨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 東漢 〈東漢元初三公山碑拓〉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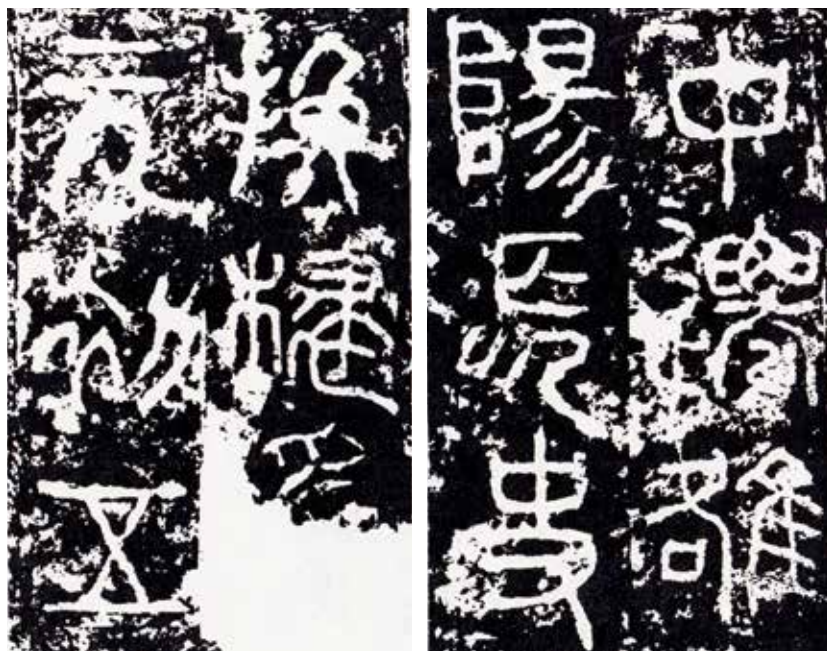


圖 16 東漢 〈李昭墓碑〉 局部



圖 17 東漢 〈漢嵩山少室石闕銘墨拓本 橫披〉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 東漢 〈漢嵩山開母廟闕銘墨拓本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 漢 〈漢維天降靈延年萬年天下康寧瓦當墨拓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0 漢 〈漢飛鴻延年瓦當墨拓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 東漢 〈漢嵩山少室石闕銘墨拓本 橫披〉後 〈蟾蜍玉兔搗藥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